

老丁垂范 后人受惠

■ 孙颀

1985年,丁景唐先生65岁,卸下担任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重担,交棒于我。我比老丁小30岁,正式进上海文艺社工作,不过才三年。同事们把我推荐出来,我很惶恐,是毋庸讳言的。刚进出版社做了半年多校对,实际做编辑的时间,不过两年多一点。虽然有总编辑副总编辑们挑着主要业务,但是,三社(另有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体的架构,二三百名员工,其中有相当多的知名大编辑,让我担纲,当然战战兢兢,夜不能寐。

按流行的说法,“扶上马,送一程。”老丁虽然没有职务了,给我出主意,帮我解难题,似乎天经地义,我绝对不会反感,反是求之不得。我希望老丁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老丁没有理会我的愿望。他很快地整理完自己的书橱书桌,一副彻底撤退的样子。他托人转过一句话,说是到这年纪,走进出版社,头皮就发麻。意思是不要勉强他。

说老丁拂袖而去,当然不对。他和我单独谈过一次,谈了近两小时,是在社长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下班以后,楼道里静悄悄的,没人打搅,他敞开心来说。他把自己碰到的棘手的事情,做完的和没有做完的,清楚地告诉我;眼面前可能还有多少麻烦,哪些部门

12月11日,文史学者、出版大家丁景唐先生去世,享年97岁。

丁景唐先生早年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丛刊》《文坛月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出版局供职,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先生备受关注的编书履历上,尤为浓墨重彩的几笔,是主持恢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包括影印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0卷本,并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一重大出版工程。

本报今特刊发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颀先生的悼念文章,寄托对丁景唐先生的哀思。



上世纪80年代末,丁景唐先生卸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与继任社长的本文作者孙颀(左)和时任总编辑江曾祺(右)合影。

会有尖锐的问题隐藏着,尽他所知,一股脑儿掏给了我。谈完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老丁打算走了。我说,我对出版社的管理一窍不通,希望他经常来点拨。老丁呵呵笑着,站起身来,并不直接回答

我的恳求,用他特有的宁波官话说道:“这里的麻烦事情,统统交给你了!”说罢,推开门,径直朝楼下走去。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挥手,似乎对他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出版社丝毫不留恋。我一直记得,那

瘦瘦的身影从旋转楼梯飘飘而下的情景。这天以后,他很少再出现在绍兴路54号。即使过来办啥事,很少到社长室,也从无人要求向我提。后来,在出版社遭遇严重危机的当口,夜深时分,我孤独

地坐在硕大的会议室里,尤其容易回忆起老丁的话:麻烦统统交给你了。

我曾经埋怨过老丁,觉得他撒手让我折腾吃苦,是不近人情。很久以后,我工作经历得多了,才慢慢体会出他用心良苦。凭他的老资格,他的威望,假如他经常出现在单位,即使他不说话,不表示具体的意见,只要他皱皱眉头,我决定什么的勇气或许就动摇了,或者,我做出了决策,也会被许多同仁所怀疑而难以贯彻。老丁以他的消失,逼迫我硬着头皮承担起社长的责任,独立地面对种种困难。应该承认,这种逼迫,是我这个青年编辑成长起来的强大推力。

后来,我工作岗位多次变动,不管是离开上海文艺社、离开新闻出版局、离开政协文史委,我坚持一个原则,离开了,尽量少出现,不是对原单位没有情感,而是像老丁一样,不要干扰后面班子的工作。消失,是最好的支持。我现在还有作协副主席和文学基金理事会的头衔,还得去巨鹿路走走,但是,尽量不对党政工作指手画脚,也是我的基本原则。

回忆老丁,他在各方面的垂范,还可以说许多,他学养深厚、见识宽广、为人正派等等。上面的一条,也许是从他手里接棒者所特别感受到的。

《文汇报》上的汪曾祺集外文

■ 杨新宇

复旦图书馆购置了自助借还机,借还都不再需要工作人员,因此常会与书有一个美丽的邂逅。近日我去还书时,恰巧看到旁边有一本别人刚还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7月出版,系徐强先生所著,于是借了回来翻阅,徐强在该书后记中说:“笔者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新版《汪曾祺全集》的编纂工作,分工主编和执编散文、诗歌、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然则,《年谱》中所列入的作品,也就是行将问世的新版《汪曾祺全集》中的全部了,《汪曾祺全集》的小说卷以《汪曾祺小说全编》之名,已于2016年出版,剩余的散文诸卷听闻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因为参加过少许《汪曾祺全集》编纂的前期筹备工作,所以我对北师大旧版《全集》失收的作品相对熟悉,对新版《全集》的工作也颇为关心。一翻阅《汪曾祺年谱》,竟发现尚有不少重要文章遗漏,如《文汇报》上的《战争》《马莲》,特此整理出来,以免新版《全集》失收,造成不必要的遗憾。



刊发于1957年4月1日《文汇报》上的汪曾祺的两篇短文

诉每一个人,我希望你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出来叫全世界都看一看:

斧头砍过的再生树,
战争丢下的孤儿。

马莲

你唱你的三,
我对你的三,
马莲开花在路边……

——儿歌

你看见过马莲吗?

马莲是一种很动人的植物。马莲的叶子可以穿鱼,揭开鱼的腮,穿过去,打一个疙瘩,拎着——这会断吗?不会!马莲的根可以做刷子,洗衣服用的刷子,炊帚、擦痰桶、擦抽水马桶用的……这样洁净的、坚韧的、美丽的根!

我真想看看马莲,看看它在浅水的旁边,在微风里,一丛一丛的,轻轻地摇动

着,摇动着细长的叶子。

我没有看见过马莲。

这两篇散文虽短,但弥足珍贵,汪曾祺在“十七年”时期的文章本就不多,文艺性的作品就更少。两篇散文发表于1957年,正如适时绽放的两朵小花,与他的另两组散文《冬天的树》《星期天》及诗《早春》一道,为“百花文学”的短暂繁荣添了一小片风景。两篇散文提供的信息也挺丰富,其风格已与建国前的散文或散文诗《私生活》(参见“文汇App”今年5月5日的拙文《毕竟,汪曾祺骨子里是个诗人》)完全不同。汪曾祺1950年夏进入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这两篇散文分别由民歌和儿歌引发,于中可见民间文学对作者的影响,但这两篇散文仍然非常文艺,篇幅虽短,其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散淡风格,已在预告他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风貌。《战争》介绍一首侏侏族(即佤族)的只有两句的歌,但前面却说了

一大通看似无关的“废话”,用一万多行的歌衬托出只有两句的歌;《马莲》就更令人“啼笑皆非”,前面像模像样地介绍马莲、赞美马莲,最后一句竟然是“我没有看见过马莲”。

另,《文汇报》在1989年还曾举办过一次1988年度的文学新人评选活动,并于1989年4月25日在《文汇报》上刊出了《关于1988年度全国文学新人的评选》的报道,当时选出的是刘恒、乔瑜、杨志军等五位作家,报道中特别提到了汪曾祺给乔瑜和杨志军的评语,关于乔瑜的《少将》,文章提到:“汪曾祺更认为‘《少将》中的‘少将’是多年来纯粹形式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教人伪善的教义所造就的一个正常的怪物。而这样的怪物,当时是随处可见,但还没有人写过。作者的语言极有青春气息和幽默感,但不流于轻佻和玩世不恭’。”而对于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则提到:“评委汪曾祺就说它‘写一群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在青藏高原铺设输油管线的工程兵的悲惨生活和他们悲惨的死。他们要去征服自然,结果却被自然征服,并被毫无心肝的社会遗弃,摧毁。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作家笔下随处带有炽热的抒情,和深邃的愤怒的思索。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少见的杰作’。”乔瑜后来编了不少电视剧,于2005年英年早逝,并未在文坛享有大名,杨志军后来则也成了名家,曾以《藏獒》系列名重一时,他的风格与汪曾祺迥异,但其作品竟被汪曾祺视为“震撼人心的少见的杰作”,亦属难得。汪曾祺的评语,当是《文汇报》编辑部所抄录,不知可否算作他的佚文,究竟该不该收入《汪曾祺全集》或可商榷,但应补入年谱则是肯定的。